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丽江分院
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

社科研究系列丛书

主 编 赵世红 副主编 李德静

纳西东巴文字概论

NAXI DONGBA WENZI GAILUN

李静生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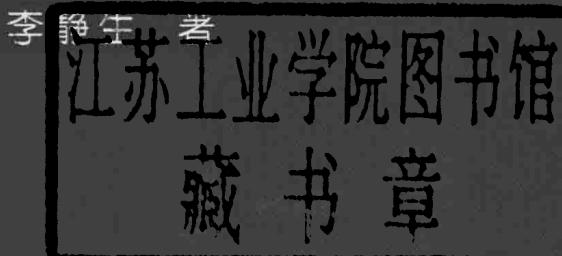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丽江分院
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

社科研究系列丛书

主编 赵世红 副主编 李德静

纳西东巴文字概论

NAXI DONGBA WENZI GAILUN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纳西东巴文字概论 / 李静生著；赵世红主编，李德静
副主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367-4406-6

I. 纳… II. ①李… ②赵… ③李… III. 东巴文—文字—
概论 IV. H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7967 号

责任编辑	郑卫东
特邀校对	余 祁
装帧设计	岳 南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1000 册
定 价	5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4406-6/H·146

总 序



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出版“社科研究系列丛书”，既是工作职责的体现，也是工作成果的展示。

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成立于 1981 年。当时是研究室，1991 年改为研究所，2004 年改为研究院，同时挂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丽江分院的牌子。其主要职责是对纳西族东巴文化进行抢救整理和科学的研究。现有人员 16 人（研究员 3 人、副研究员 5 人、助理研究员 1 人、研究实习员 3 人、电子助理工程师 1 人、工勤 3 人）。其中：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 2 人，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1 人，市级劳模 1 人，市管专家 1 人，市级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1 人。东巴文化研究院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黑龙潭公园内，土地面积 2 492 平方米，建筑面积 1 387 平方米，房屋 49 间，收藏东巴古籍 2 000 册，文物 200 多件，图书 10 000 多册。

东巴文化研究院曾获得一项第七届中国图书奖，获得一项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获得一项云南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得八项丽江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被评为云南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先进单位。

东巴文化研究院成立 20 多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为弘扬民族文化，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促进民族文化建设，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整理翻译出版《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 卷

东巴文化研究院在 20 多年时间里，经 10 多个研究人员、10 个东巴的努力，整理翻译 1 000 多册东巴经。经过分类，除去重本，汇编成“四对照”（原文、记音、对译、意译）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 卷，作为国家“九五”重点出版工程，于 1999 年～2000 年正式出版，并荣获第五届国家图



书奖。

2. 东巴古籍文献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成功

2003年，在丽江政府的领导下，东巴文化研究院组织开展纳西东巴古籍文献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工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工程评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纳西东巴古籍文献被批准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为丽江拥有三大世界遗产作出了贡献。2005年，在丽江成功举办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评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3. 东巴文化进入大学殿堂

2002年，经云南省教育厅批准，东巴文化研究院与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院共同开办“纳西族语言文学和东巴文化方向”本科班，本院承担了专业课程的教材编写和授课任务。云南民族大学实践教学基地已在本院挂牌。2003年，经重庆市学位委员会批准，东巴文化研究院与西南师范大学文献所共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授权点。从而使东巴文化登上大学殿堂，填补了东巴文化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的空白。

4. 东巴文化图书出版取得可喜成果

东巴文化研究院在20多年时间里，还编写出版了一系列东巴文化图书。1993年，编辑出版《东巴文化艺术》画册，荣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2003年，编撰出版《西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第12卷~14卷（纳西族文献），编辑出版《东巴文化研究所论文选集》和《纳西族东巴教仪式资料汇编》。另外，研究人员个人编著出版《东巴象形文异写字汇编》、《东巴经典名句欣赏》、《异域之神的乐土》、《纳西族与东巴文化》、《纳西族东巴文字画》、《东巴艺术》、《纳西象形文字字帖》、《通俗东巴文》等书。20多年来，全院研究人员在国内外刊物上共发表200多篇论文。在整理纳西东巴古籍文献的过程中，东巴文化研究院还编印了《纳西东巴经专有名词汉译规范》、《东巴经分类目录》、《纳西族东巴经选译》、《滇川纳西族地区民俗宗教调查》等图书资料，录制了8个东巴仪式录像和45盘东巴诵经录音资料。制作出版了纳西“谷气”演唱东巴经“三大史诗”CD光盘。与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合作完成《灿烂的中国文明》中的两个专题《东巴艺术》和《丽江》的网上出版项目。

5. 社科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

东巴文化研究院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一系列社科课题和项目，完成云南省社科“九五”课题“纳西族东巴教29种仪式资料整理”，完成国家和省民委古籍办下达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的编写任务。与中央民族大学合作编撰《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经籍汇编·纳西族分卷》，完成云南省社科“十五”课题“东巴占卜典籍研究”，与云南省中医学院合作

完成“东巴医学研究”，完成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照片之声”项目，完成美国乐施会“拉市海流域生态史”项目，完成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东巴造纸与社区生计”和“东巴文化与森林保护”项目。与日本技术评论社合作完成《纳西东巴象形文字计算机图像化处理》。与云南省计算中心合作完成“云南省民族文化遗（东巴祭署）数字化研究与应用”，完成福特基金会和省社科院合作的“社区乡土知识教育”项目。正在实施德国米苏尔基金会和省社科院合作的“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培训”以及“贫困学生助学”项目。承担国家教育部、国家语委批准立项的“纳西东巴文国际标准化”项目，为最终申报东巴文国际标准化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正在进行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大丽铁路建设区民族文化保护与能力建设课题”。2006年，我院申报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纳西东巴大词典》，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获准立项，目前正在对东巴字词的收集工作。

6. 广泛开展国内外学术文化交流活动

我院先后参与组织召开三次全国性和二次国际性东巴文化学术研讨会。研究人员先后20多次应邀到美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日本、泰国、印度、韩国、新加坡、柬埔寨、越南、菲律宾等国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我院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德国米苏尔基金会、东南亚传统知识与人民工作网、亚洲原住民公约基金会等机构和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先后接收十多名外国学生来东巴文化研究院学习纳西族东巴文化，帮助他们完成研究论文。近年来，开始着手对收藏在美国、加拿大、瑞典以及我国台湾的东巴古籍进行整理编目翻译工作。

7. 东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得到加强

全面贯彻《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认真实施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东巴文化保护与青年发展培养项目”，重点培养东巴传人，大力扶持民间的保护传承活动，做好东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我院在对玉龙县塔城乡署明开展东巴文化保护工作的基础上，还在宝山乡、悟母乡和鲁甸乡新主开展了东巴文化保护工作，多次到三个传承点调查，派人辅导传授，举行各种有意义的东巴仪式。此外，还积极争取国内外支持，在资金、服装等方面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在东巴传人的培养方面，继续坚持东巴自然传承和研究人员辅导相结合，在研究院学习和在民间学习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支持东巴传人到民间开展东巴文化民俗活动，收到了学习和传承双赢的效果。

我们已经取得了上述一系列可喜的成果，但我们绝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我们每个研究人员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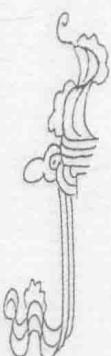
会。经过 20 多年东巴古籍的翻译整理，我们每个人的抽屉里都装满了厚厚的资料；在每一项课题和项目完成后，形成了一本本珍贵的书稿；在进行田野考察时，我们都写下了丰富多彩的调查笔记；在承担和完成大学的教学任务的同时，编写了一本本讲义和教材；在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会时，提交了一篇篇学术论文；…… 更为珍贵的是：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科学研究经验，为今后源源不断地推出新的成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为鼓励我院科研人员多出研究成果，我院从 2007 年启动了社科研究系列丛书的编著出版工作。凡我院人员个人或数人合作完成的社会科学学术性科研成果（包括专著、论文集、调查报告、古籍整理、工具书、科普读物、教材、译著等），均予以分期分批出版。这既是对我们研究成果的一种展示，也是我们对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份贡献，同时我们希望得到学界的批评指正。

今后，东巴文化研究院将发挥好研究开发、保护传承、教学交流等几大功能，努力做到出人才、出成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赵世红

2007 年 12 月



叙 言



纳西族源于我国西北河、湟谷地的古羌人，秦汉时往西南迁徙。约在唐武德年间迁徙至今云南丽江定居^①。纳西族古称“么些”，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民族。

东巴教是纳西族的原始宗教，这种宗教产生于纳西族先民原始社会阶段并流传至今。东巴教信仰万物有灵，几千年来它支配了纳西人的精神世界。东巴教的祭司称“本补”[py- b̥y]、“打恒”[da- hwi]、“许虽”[cy- sue-]等。依所作仪式不同而称谓各别。另外，一般又把纳西族东巴教祭司称为“东巴”[to- ba]。“东巴”为祭司神“丁巴什罗”之简称。后世祭司自以为都是东巴什罗的弟子，民间一般也都叫他们为“东巴”。东巴死后，要作超度东巴什罗仪式。有专家以为，“东巴什罗”乃源自藏族苯教，于唐朝初年传入纳西族地区。传说如果可信，那么“东巴”之称不能早过唐。从汉籍资料看，李京于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写的《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与徐霞客于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写的《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都对纳西人的宗教活动有所记述。李京和徐霞客都是亲历丽江，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可惜他们的笔下都未记及对纳西祭司的称谓。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丽江知府管学宣命万咸燕撰修的《乾隆丽江府志略·风俗》则有如下记载：

土人亲死，既入棺，夜用土巫名刀巴者，杀牛羊致祭。亲戚男女毕集，以醉为哀，次日送郊外火化。

从这条材料看，对纳西祭司“刀巴”（即今所译之“东巴”）之称，不能晚于乾隆八年。“东巴”之称流行以后，“本补”、“打恒”、“许虽”诸称便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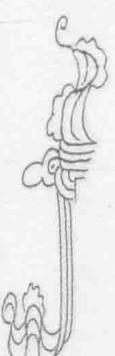
^①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绪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



于文本中了。

东巴教传至近代，约有30来种宗教仪式，用于这种仪式上的书，约有1000种左右。1949年以前，纳西族地区农村山寨多有东巴，有的村子竟有五六个东巴。各村的东巴司掌村中一年的宗教事务。东巴也可以应邀到其他村寨活动。东巴教的仪式粗略可分为两大类：①为一年中在固定的时间里举行的仪式。②为有事才举行的仪式（即非固定时间里举行的仪式）。用一句纳西语概括，那就是“什居董居”[sɔr↓ dzy↓ du↓ dzy↓]。前者是“董居”，如正月要祭天，二月要祭“署”之类。后者是“什居”，如人的生老病死，起房盖屋等所作的仪式。

东巴分两种，一种纳西语称“本补盘”[py↓ by↓ p'ər↓]，另一种称“本补纳”[py↓ by↓ na↓]，“盘”、“纳”即“白”、“黑”。“本补盘”只作祈福类仪式，如祭天、祭署、祭家神、祭五谷神、祭畜神、烧天香等仪式。“本补纳”则能做一切仪式。有些仪式一般东巴不敢做，如替凶死者超度的仪式。据丽江塔城乡署明村东巴和世先说，解放前，整个依陇巴甸地区（过去东巴盛行之区），都只有两家东巴有能力做替凶死者超度灵魂的仪式。一家是学智家，另一家是东巴崩达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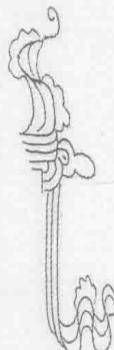
东巴传承一般是父传子的形式，相传的代数越久，其东巴的威力便越大。东巴不是职业宗教祭司，平素常间是农民，照样干农活、放羊。过去东巴家男孩一般到五六岁就开始向父亲学习东巴的知识，白天劳作，晚上坐在母房的火塘边，父亲就教儿子学习东巴知识。这个情景，在东巴经《除秽·加神的威灵》一书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拉卡梭本若，有三驮东巴经，阿父坐在高处，儿子坐在下方，一册经书翻了一千遍，另一册经书翻了一百遍。聚集了千页的经书，阿父读了拿给儿子，儿子读了又拿给父亲，每本经书诵来首尾都不差错了。”从经书描述的情况看，学会一本经书也是不容易的，同时也说明了东巴是不可以任意增删经书内容的。这里强调多读、多练、不出差错。东巴们抄写东巴经和诵读东巴经不能差错是有共识的，过去的东巴每写完一本书，往往要记上一段跋语，跋语中往往要强调这个问题。如大东巴和文质写的东巴经《延寿·祭署建署塔》一书的跋语中说：“……（这书是）我在27岁的这年写的，虽然手迹不好（写得不甚好看），但写来首尾不差错了，以后不能当作不值价的东西，不能不尊重它。”又如《祭署、抛刹道勾多面偶》一书跋语：“……（这书是）没若注写的，写来没有差错了，诵时也不要差错。”这种强调“不能差错”，在东巴经“跋语”中比比皆是。因此那种以为东巴在诵读经书时，可以任意填补其空隙的说法是不对的。据当年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工作的老东巴们的讲述，他们幼时学东巴经书都要求背诵。

每当有仪式做，老东巴都要带上自己的弟子作助手，让弟子在具体的仪式操作中学会各种仪式规程，学会制作各种祭木，使用各种法器，吟诵经书，跳各种东巴舞蹈。从五六岁开始，学到 20 岁左右，聪颖弟子一般能独掌仪式，成为东巴。

过去，一般东巴之家都藏有足够的东巴经书。“东巴经”，纳西语称“东巴特厄” [to- ba ↓ te- w-]，是“东巴的书”的意思。纳西语中无“经”的概念，所谓“东巴经”是学者们对“东巴的书”的称谓，可能以为既然是宗教的书就应该有神圣性，故有是说。东巴经用一种民间土法制作的纸装订而成，纸质坚韧厚重、耐磨，其原料主要是构皮。这种纸不一定由东巴自制。经书一般长 26 厘米，宽 6 厘米。每页一般分为上、中、下三行，每行若干格，分格的竖隔线有标点断句功能。写经书的笔，一般由山竹削制而成，就地取材，简单易得。也有用蒿秆削制的笔，这种笔纳西语称“不呂” [puw ↓ ly-]，“不” [puw ↓] 即 [puw-]，蒿枝的意思，“呂” [ly-] 为量词，与汉语量词“杆”相当。汉语“一支笔”，或可谓“一杆笔”。因此“不呂”本义或许为“蒿秆”。若是这样，蒿秆制笔当早于竹笔。竹子制笔，不唯纳西族为然，据陈梦家先生说，早期汉族先民使用的笔，也是“但削竹木的枝而成的”^①。民国时期，在丽江宝山地区发现一种铜笔，铜笔所写的东巴经书文字笔画细而匀，但未及广传，东巴教已走向末路。书写东巴经所用的墨，也是就地取材。过去纳西人夜间点亮一般用“松明子”，母房火塘边是一家人生活的中心，晚上烧上“松明子”，一家人围坐火塘边。“松明子”燃烧时，一股浓黑的松烟上蹿。为了防止烟子在屋里乱飞，人们便在“松明子”台的上方覆吊一瓦盖，油烟可吸附盖上。久之，积下一层厚油烟。东巴制墨便取下油烟，再用一种名叫“季古都鲁” [tci] ky- tv- ly ↓] 的植物的根所制的药水调和油烟，便成了写经书的墨。现在看来，这种“药水”有两种功能，一是防虫蛀，二是使松烟墨增添光泽。

东巴经文的文字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情况依地区不同而有差异，就丽江东巴经而言，大东、鸣音片区的东巴经记词字符较省（即用字较少），鲁甸、塔城片区的东巴经记词较详（即用字较多）。但总的来看，象形文记词的东巴经，几乎都是省略式的。这就是东巴经不能离开东巴们识读的本质原因。没有东巴的识读，一般人即使学会了所有东巴字，也无法读东巴经。因为一般人并不知道字与字之间究竟省去了些什么词。但东巴们是知道的，因为他们主要是靠背诵。犹如汉人的蒙童背古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① 陈梦家：《中国文字学》，第 130 页，中华书局，2006 年 7 月版。



这诗已经背得很熟，因此只要你写出“白日依山尽”，这首绝句的下面三句是什么已了然于心。但假如把“白日依山尽”拿给一个从未读过这首诗的人，对这个人来说诗的下面三句，实在是一个谜。

人们所收藏的东巴经，约计3万册，但其种类而言，可能不超过1000种。《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共收897种书。

通常所说的东巴文，实际上包括两种性质不同文字体系。一种纳西语称为“森究鲁究”[sər- tṣə] [lv- tṣə]。“森”是“木”的意思，“鲁”是“石”的意思，“究”是“痕迹”，“森究鲁究”是木石上的痕迹，引申之为“文字”。另一种称“哥巴特厄”[gə ba t'e- wə]，“哥巴”即“弟子”之意，“特厄”即“文字”，“哥巴特厄”即是“弟子的文字”。相传为东巴教祖师东巴什罗的360个弟子所创。在学术上，前者称为“图画象形文字”、“纳西象形文字”、“东巴文”等。后者称“哥巴文”、“标音文字”、“音节文字”、“音字”等。关于这两种文字产生孰先孰后的问题学术上有争议。美国学者洛克以为“哥巴文”先于“象形文”，而我国学者一般都认为“象形文”早于“哥巴文”。现在收藏的东巴经中所记录文词有三种情况，一是全用象形文所记写的写本；二是主要用象形文，偶尔参杂有哥巴文的写本；三是纯粹用哥巴文所记写的写本。但现藏东巴经主要是前两种情况，第三种是极为少见的。象形文写本是省略语词写本，哥巴文写本是全记语词写本。哥巴文写本之不发达，除了这种字的晚出和局部地区才有之外，与字符本身的符号性、抽象性、多声调、多异体等问题有关。这两种文字，实际上是东巴们所创、东巴们所用的文字。因此，不论是“森究鲁究”，还是“哥巴特厄”都应叫“东巴文”。然而今天在东巴文研究领域，“东巴文”已成了“森究鲁究”的专名。

关于东巴文产生的年代，我国前辈学者方国瑜、李霖灿都曾对此进行过研究，但由于找不到直接证据，因此，没有一个确切可信的说法，应该说这个问题是至今尚待解决的问题。

东巴文究竟有几个字符，这又是东巴文字研究领域的一个问题。从目前流行的两本字典收字情况看，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编列1340号字，李霖灿《么些象形文字字典》编列2120号字。但两书所列字号，并不等于实际的字数。因为这两本书都存在着重收字和不应该作为字符处理而收编入号的情况。

东巴文字主要用于东巴教祭司东巴书写经书，但掌握这种文字的人偶尔也应用于日常的记事中。如：记账、记契约文书、书信等等。这种记事文件，其记语词均为全记式，没有省略式。

纳西东巴文被学术上所注意，发轫于19世纪中叶。据杨福泉先生译介，

法国传教士德古丁斯是第一个把纳西东巴古籍文字介绍到西方的人。他于1867从云南寄回巴黎一本有11页的东巴经，这本东巴经的名字叫《高勒趣赎魂》。1885年拉卡珀尔（欧洲人）发表了名为《西藏境内及周围的文字起源》的文章。1913年法国人巴克出版了名为《么些研究》的专著。在巴克的书中介绍了他从1907年到1909年两次到纳西族地区调查所得的370多个东巴象形文字，并对纳西族的语言和词汇、语法作了初步研究。美籍奥地利人洛克，于1922年至1949年长达27年在纳西人居住的地区收集了大量的东巴经和其他东巴文物，并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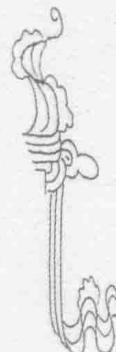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国学者注意到了外国学者对纳西东巴文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并有方国瑜、李霖灿，傅懋勣等学者到纳西族地区，作了更为深入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1935年，方国瑜写成《么些文字汇》的稿子。1944年李霖灿完成了《么些象形文字字典》的编写工作，并由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次年他又完成了《么些标音文字字典》的编写和出版工作。1948年傅懋勣写成《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并在武昌出版。通过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东巴文的特殊价值，被更多国内著名学者所知，并引起了他们的高度注意。

1949年，李霖灿去了台湾。之后，他利用40年代收集记录的资料，继续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49年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巴教很快受到了这样那样的批判和打击。纳西人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这种原始宗教文化，一时成了“封建迷信”和“牛鬼蛇神”，其宗教祭司东巴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一时间，丽江的村寨里，东巴教活动已销声匿迹，同时学术领域的研究也已鸦雀无声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时任丽江县委书记的徐振康，他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他不忍心看着祖国的这份文化瑰宝这样就消失掉，便下令让县委宣传部组织人力，聘请东巴，拔出专款去搜集、整理、翻译东巴经。当时从民间收集到不少东巴经，翻译并石印了22种，但好景不长，接踵而来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止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徐振康也因此受到批判，几乎丧生。

“文革”以后，万幸的是当年收藏在丽江县图书馆的5000千余册东巴经还安然无恙。而1949年以前就学有所成的一些东巴老人还活着，但他们的年龄也已是六七十岁。一是书，二是人，这是抢救东巴文化的两个基本条件。纳西族有识之士和万宝、方国瑜等抓住了历史的契机，组建了“东巴文化研

^① 杨福泉等编译：《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第1页~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究室”（后改为所、院），在该研究所 20 余年的不懈努力下，翻译、整理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抢救纳西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东巴文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从研究东巴文的意义上讲，它已较为完整地给学术界提供了这种文字记录纳西语的古典文本，从而对东巴文字的全面深入的研究成为可能。因为此前这方面的可用资料仅仅是两三部字典和 20 余种经书译本而已。

历史发展到 21 世纪，东巴文这种原始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功用已逐渐淡出。而它所独有的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则日益凸显。东巴文、东巴已经被外人所看重，甚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记忆遗产，也是基于这种价值的存在。

东巴文对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已被不少学者所指出。例如，刘半农说：“用这种文字（指东巴文）来参照研究人类的其他原始文字，是很有价值的。”^① 傅懋勣说：“在古代文字发展的过程中，由简单的表意图画发展到图画文字就进入了文字的范畴。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然后由图画文字发展到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的象形文字或者叫做形意文字，或者也产生了形声字。这是文字发展的又一个步骤。感谢纳西族的祖先在文字发展的这两个步骤上，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重要范例。特别珍贵的是，纳西族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完整的、依靠东巴经师可以完全读出来并且解释清楚的图画文字的经书。我们不能说古代图画文字的类型完全和这种图画文字相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图画文字的经书，是我们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古代图画文字的一种最有价值的范本。”^② 甲骨学家董作宾说：“我之所以注意么些文字，不在音而在形，我打算拿这种象形字来比较汉文的古象形字。或者可以帮助我们对古文字得到更真切的认识和了解。”^③ 其后，方国瑜考甲骨文“古”之本义^④，于省吾考甲骨文“亚”之本义^⑤，均利用了东巴文作比较，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

审美价值方面今天已得到相当体现。由于东巴文是图画面象形文字，象形特征明显，它原始古拙的形态令世人惊叹。因此，利用这种文字素材而制作出来的工艺美术品目前在旅游文化市场很受欢迎。丽江的许多商铺招牌、甚至政府机关的名称，都乐于用东巴文去装饰。

^①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弁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 4 月版。

^② 傅懋勣：《纳西族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区别》，载《民族语文》1982 年第 1 期。

^③ 董作宾：《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序》。国立中央博物馆专刊乙种之二，1944 年 6 月。

^④ 方国瑜：《“古”之本义为“苦”说》。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 年第 5 期。

^⑤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亚”》。第 337 页~339 页，中华书局，1979 年 6 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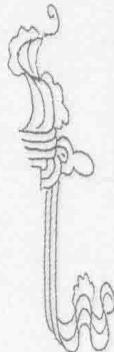
总 序 赵世红/1
叙 言 /1

目 录



上 篇

第一章 东巴文字的创制 /3
第一节 东巴文创制的传说 /3
第二节 东巴文创制年代的推说 /5
第二章 东巴文字的结构特征 /17
第一节 象形字 /24
第二节 指事字 /51
第三节 会意字 /65
第四节 形声字 /81
第五节 假借字 /95
第六节 转意字 /110
第七节 黑色字 /115
第八节 东巴文字的性质特征 /118
第三章 哥巴文字的创制 /141
第一节 哥巴文字创制的传说 /141
第二节 哥巴文字创制的年代问题 /141
第四章 哥巴文字的结构特征 /145
第一节 蜕变于东巴象形文字的表意字 /145
第二节 另创的表意字 /150
第三节 借汉字之音和借汉字之义的哥巴文字 /152



第四节 自创的记号字 /157

第五章 东巴经文释例 /159

第一节 东巴经 /159

第二节 经文释例 /160

下 篇

第六章 民国时期的东巴文字研究 /181

第一节 杨仲鸿的研究 /181

第二节 方国瑜的研究 /188

第三节 李霖灿的研究 /206

第四节 傅懋勣的研究 /226

第七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东巴文字研究 /229

第一节 方国瑜的研究 /229

第二节 李霖灿的研究 /231

第三节 傅懋勣的研究 /237

第四节 和志武的研究 /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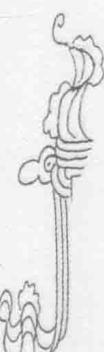
第五节 王元鹿的研究 /245

第六节 喻遂生的研究 /251

第七节 洛克的研究 /255

第八节 西田龙雄的研究 /265

后 记 /269



上 篇

